

故宮

名人書札

明 代

明

故宮藏明清名人書札墨跡選

清

榮寶齋

墨

跡

選

故宮

顧問

劉九庵

王南訪

主編

張魯泉

執行主編

傅鴻展

故宮藏

明代一

明清名人書札選

行同



(京)新登字019號

策 劃 陳富生
責任編審 王鐵全
責任編輯 蕭新柱
技術編輯 徐 航
高瑞彩
李 剛
扉頁題簽 舒 同
封面設計 羅 洪

故宮藏明清名人書札墨跡選•明代一

張魯泉 傅鴻展 主編

出版發行：榮 寶 齋（北京宣武區西琉璃廠）
總 經 銷：新 華 書 店 總 店 北京發行所
排 版：好 利（北京）電 腦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中 國 農 業 科 學 院 情 報 所 印 刷 廠

開 本：850×1168 1/16 印張：14

1993年9月北京第一版 1993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03-0212-6/J·213

1-005680

說明：本集中所收錄書家排列以生卒年代為序，個別書家順序因照顧版面安排而有所調整，
特此敬告讀者。

目錄

前
言

明清尺牘及其書法價值

淺談尺牘與尺牘書法

後記

張魯泉

167 163 161 159 157 155 153 151 149 145 141 137 135 133 132 129 123 121 119 117 115 113 111 109 107 103

229 223 221 219 217 215 213 211 207 205 203 201 199 197 195 193 192 191 189 185 181 177 175 173 171 169

112	111	110	109	108	107	106	105	104	103	102	101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91	90	89	88	87
丁雲鵬	孫鑛	陳永年	陸士仁	顧憲成	張鳳翼	張鳳翼	屠隆	焦竑	徐顯卿	詹景鳳	陸應陽	顧雲龍	張燕翼	嚴澍	申時行	王穉登	王錫爵	子弟帖	榮旋帖	王世貞	項元汴	袁尊尼	莫是龍	徐渭	袁福征
致聖卿札	致勤之札	致夢池札	漸寒帖	致景逸札	致五湖札	致慎翁札	光明帖	遠訪帖	容光帖	致斂川札	致磬室札	致馨翁札	致馨老札	致浮玉札	惠教帖	致益卿札	子弟帖	榮旋帖	致伴松札	致竹園札	致元皋札	致素行札	致文卿札	致叔奕張老札	月下桃花詩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9	277	275	273	271	270	269	267	265	263	261	259	258	257	255	253	249	247	245	241	239	237	235	234	233	231

279 277 275 273 271 270 269 267 265 263 261 259 258 257 255 253 249 247 245 241 239 237 235 234 233 231

347 346 345 337 333 329 328 327 325 323 322 321 319 317 315 313 311 309 305 299 297 295 293 291 283 281

157 156 155 154 153 152 151 150 149 148 147 146 145 144 143 142 141 140 139

李流芳	致伯昭札
宋珏	致仲平札
王思任	文門帖
姚希孟	廣陵帖
侯恪	熱病帖
俞琬綸	錢梅帖
明綱	陶瑢帖
許令典	致道文札
楊嘉祚	致方老札
顧杲	致芝眉雅誼札
周順昌	致埜翁札
周順昌	魏廓帖
文震亨	致孟老親丈札
沈顥	致虞卿札
倪元璐	致休老札
邵彌	涉夜帖
侯峒曾	題祝京兆行草三種
高賢帖	致稼翁札
陳仁錫	致稼翁札

379 373 372 371 369 368 367 366 365 364 363 361 359 357 355 353 352 351 349

175 174 173 172 171 170 169 168 167 166 165 164 163 162 161 160 159 158

葛徵奇	致韓姪札
眭明永	烹鯽帖
鄒典	致玉剛札
陳適	致均老二札
楊文驥	致毗翁札
歸莊	致瞻思札
陳洪綬	致秋老人札
劉若宰	靈谷帖
黎元寬	馳問帖
祝淵	午前帖
黃宗明	致路老先生札
陳澤	詩翰札
楊守阤	石刻帖
魏學禮	東陽帖
顧清	致石樓札
徐枋	致震老人札

417 415 409 407 405 399 398 397 395 393 391 389 387 385 384 383 382 381

前言

張魯泉

書札，或稱手札，或曰尺牘，即是古代人寫的書信。追溯到公元二二〇年以前，我國就有保存、蒐集、珍藏名人書札的嗜好與習慣。據文獻記載，後漢的書法家「陳驚座」因寫得一筆好字，所以「與人尺牘，主皆藏之以爲榮。」事見《後漢書》陳遵傳，爲張懷瓘《書斷》所引，故宮博物院所藏傳世最早的一件名人墨跡——西晉陸機《平復帖》就是一通與朋友的書札。東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其書法爲歷代書家所宗，而保存下來的書法作品，很大一部份是書札手跡。由此可以看出，書札在保存書法藝術以及在書法史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人們最初對信札的愛好與收藏，首先注重和欣賞的是其書法價值，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爲書札是一種私人之間的通信，書寫起來，不像正式寫碑碣、奏疏、匾額、墓誌等那樣，因嚴肅而受到某些拘束，書札往往多用行草書體，隨意所至，自由暢快，書寫者的感情，就自然地流露在筆墨中，更容易看到一出書家的平素修養和工夫，表現出高超的藝術水平。

書札同時也是歷史文獻。它所涉及到的包括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社會生活各個方面。也正因爲書札是私人間的通訊，它無需掩飾與遮蓋，所以反映的內容，往往能夠真實地表達出書寫者的思想與感情。史可法與他母親和妻子的一通書札之所以爲人們所寶重與傳誦，正是因爲這個愛國將領的民族氣節與寧死不屈的精神，在家書中表露出來而更顯崇高。當然某些公開信件和故作姿態的又另當別論。那些在歷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政治要人、或者某些文獻材料缺乏的文學家、藝術家等的通信，對於我們了解他們的真實思想、行爲、身世、交友等是十分重要的，有可能從這裡發現新的歷史資料而提出新問題、新論點，改正過去的錯誤和看法。

因而書札一向爲學者們所注意。書札的書法價值和歷史文獻價值，是不可忽視的兩個方面，而明清以來的書札，後者似乎尤勝於前者。

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歷代名人書札異常豐富。明代以前的書札，大都作爲書法藝術珍品，曾經多次影印出版和公開陳列。而明清兩代以來的書札，因爲這一時期流傳的書法藝術作品很多，所以一時無暇從藝術角度去顧及它們的陳列和出版。至於文獻價值，則只有極少的書札，曾在一些書刊雜誌上介紹過。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明清名人書札，從數量上來說，數以萬計，從質量上來看，歷朝名人幾乎齊全，除了那些書家、作家、詩人、畫家之外，一些封疆大吏、宮廷臣屬，特別是晚清的各種政治歷史人物尤多，真是數不勝數，這中間究竟保存有多少書法藝術珍品和歷史文獻資料是有待發掘的一個大寶庫。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間，我同很多人都有過共同命運和遭遇，曾被安置在故宮博物院研究室工作，但卻沒有具體的工作任務。我不忍心吃閒飯，因平時喜愛書法藝術，就提出要求看一些院藏名人書札，得到院領導的大力支持，有幸得以接觸這些寶藏。這一批從四五百年前到近代的文物，故宮博物院都保存得十分完好，其裝璜異常講究，開卷之後，墨香撲鼻，沁人心脾。細讀來，有的書札，其文，如鳴泉出澗，如滄海揚波，胸潮隨文起伏澎湃；其字，似游龍騰空，似猛虎據巖，精神爲之振奮飛揚，真叫人享受不盡，其樂無窮。至於其間所包含的歷史文獻價值，因我既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其它科目的學者，所以雖置身於寶山之中，卻不認得真寶。但我有一個想法，既然這裡有這麼多的寶貝，又何不讓那些識寶者

都來認一認呢。於是產生了出版的想法。只是那時無能爲力。後來我離開了故宮博物院，恢復了原來工作，但這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忘懷。一九八二年離職後，我再次來到故宮博物院，繼續讀這些名人書札，前後讀了數千通，越發感到出版的必要，就大膽地向故宮博物院領導建議，得到了院領導和保管部王南訪、劉九庵等同志的熱情支持和幫助。

本集共選了明代名人書札約一百八十余通，爲了便於學者和讀者了解書札的原貌，全部采用原大影印，同時附有釋文和作者小傳。釋文和小傳是由劉九庵、王沛雲、傅鴻展、華寧等同志完成的，在此一併說明，並致謝意。由於我的學識淺陋，選編不當之處，在所難免，如能得到讀者賜教，非常感謝。書法家協會主席舒同同志在百忙中爲本書題簽，非常感謝。

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作於北京西皇城根南街九號院宿舍。

明代尺牘及其書法價值

傅鴻展

尺牘，即書信，為古語，至今仍有稱書信為尺牘者。古代社會人違兩地，互通信息所言內容皆書於木竹簡上傳與對方。木竹簡長約一尺，故曰尺牘、尺簡、尺札。紙的出現，替代了木竹攜帶之不便，而所印制篇幅，仍然以尺幅為例。因此，人們把往來書信稱為尺翰、尺書、尺素等等。尺牘雖小，但包涵着豐富的內容，有着一般古籍所替代不了的歷史文獻價值和文學藝術價值。張魯泉、劉九庵兩位先生所選集的明代尺牘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諸多類型的歷史文獻資料中，尺牘類可算是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之一。它通過尺牘傳遞，反映人與人之間思想、行為的交流，如告誡規勸、敷陳政事、評讚著述、議論是非、臨別致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尺牘比較具體和真實的記載書信者對社會政治以及社會所發生事件的看法，展示了歷史人物生活狀況。

一、尺牘的史料價值。

1、有關涉政內容：

〔敏於五月廿三日升中書舍人〕（劉敏 致庸齋札）。

〔冢宰上疏告老不准，昨晚再上，堅欲致仕〕。（吳寬 致貞甫札）。

〔詢及家父旌異之事，蒙禮部劄付，覆勘旦夕，本縣將上封章于朝廷，可謂榮幸〕（朱存理 致半隱札）。

〔所云府學考案，不知曾付之何人否〕（文彭 致高陽太僕札）。

〔奏疏未知得一一入覽否，暇中尋而披閱〕（楊一清 致希大札）。
〔今轉南京戶書并此奉知，兩京堂上時有缺員，不久召入，……尤望推愛〕（吳一鵬 致顧翁札）。

〔僕輩限期在三月初六日，係是四月廿二日以前，未發覺之事，此時到監，或可赦沈原村，亦是過限，今五月中去，想為赦耳〕（王守 致直夫札）。

〔郭欽齋凶人一案，姚令初審即一發破的，其後屢轉百端，天日幾成幽晦，賴天道神明，凶人事露，字字符於初鞫〕（張瑞圖 盛令帖）。

〔而兄此所曹犬為慘酷，此時更不須遠引佛法以解，譬如目前黨禍諸君子無辜受罪，身被五刑，此豈非宿命所招〕（李流芳 致伯昭札）。

2、有關兵事內容：

〔家兄四月廿八日出京致陝軍中紀功，幸北虜引退〕（王寵 致石壁札）。

〔別後以十月到官，今五月改兵曹，即值有倭寇之警，日夕逐逐無少間〕（朱日藩 致文石札）。

3、有關經濟方面：

〔兵戈離亂之慘不忍言，亦未知禍之所止〕（唐順之 致二弟札）。

〔邇來大事相仍，兵喪併集，帑用費給，而耗費愈曾〕（李東陽 致應寧札）。

〔專求兄同周玉亭面商，一便宜計，須利之最輕者為妙，殘歲租事中即還萬賦可虞也。〕（俞琬綸 陶琬札）。

4、有關文學藝術方面。以議論書畫為多。

〔玩前輩所書能自成家，不爲奴書，宜與有傳〕（張弼 墨藪帖）。

〔尙之先生篆書當書，只是忙中難做細生活〕（徐霖 致子寅札）。

〔李寄我煙家韻詩四首，在扇頭當令人錄寄覽〕（孫鑛 致勤之札）。

〔昨過多慢，持人乞完奄劉公像一閱，方正學，楊鐵、王陽明、林和靖四像，偶有冗不及尋出，俟容送觀也〕（袁袞 致馨室札）。

〔南山長老所藏趙子昂手跡，已承指示去路……促此僧即持來當出高價〕（項元汴 致竹園札）。

〔今觀文蔚所藏祝京兆行草三種，如夏云奇岸〕（邵彌 題祝行草三種）。

〔米南宮昉楮河南，河南昉謝莊，顧愷之，世間書法未了不從晉入門者。〕〔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盡，又精妙奇觀也〕（邢侗 致幼芝札）。

〔欲乞我丈寺額，撮襟大書以鎮山門，所謂翰墨作佛事〕（陳斷儒致天池札）。

5、有關生活方面的記載更是舉不勝舉。

〔聞得一令愛，喜事重重，尙當奉賀也〕（王汝 致匏菴札）。

〔日課時義三篇，僕以爲太多，或一日一篇，或兩日一篇皆可，貴精不貴多，亦時文要言也〕（文嘉 致玄旻札）等等。

上述明代尺牘中涉政、兵事、經濟、文學、藝術、生活方面的記載，不僅反映了這一時代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往，彼此微言闡性的酬酢關係，同時還反映了時趨通變，以及海內毀譽紛爭的歷史現況。這些文獻記載，爲我們研究明代歷史增添了大量的生動、具體的新資料。

二、尺牘的書法藝術價值

大量的明代尺牘之所以能夠保留至今，不僅僅因它囊括了大量的歷史

文獻資料，其中還有一點更重要的是這些尺牘出自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名人之手。在他們當中，有身居高官、顯赫一時的朝臣，有冒死彈劾奸佞而屢遭貶謫的忠杰，也有維護朝廷而奮起抗清的忠賢之士。他們不但在經國大業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同時在制藝方面也頗富成就。

就書法而言，本集尺牘中的很多人都是從事書法創作的大師，如早期的張羽、楊士奇，中期的沈周、張駿、張弼、吳寬、祝允明、文征明、王寵、陳道復，晚期的邢侗、董其昌、張瑞圖、倪元璽、黃道周等。他們在咫尺的篇幅上馳騁揮墨，游弋紙田，盡情於線條的揮灑律動之中。小幅尺牘書法，雖與條幅中堂大墨淋漓奔騰無羈的跳躍動蕩之勢相比，受到空間狹小的局限，但它以其特有的書法形式，在線條參差錯落，縱逸疾速的字里行間，刻意求精，展示着真率自然的書法藝術獨特魅力。尺牘作為信件，乃爲代言之作，用以應答，請托，索求，告慰對方，是以互通音訊爲目的。所用心者，乃直抒心境盡述于對方，行文措辭，意達則止。諸如狀景物之悲愴，述境遇之甘苦，記湖山之閱歷，窮風月之感懷，寄思慕以紓軫，寫性情而相規勉，通過經歷中的感受傳告對方。因此尺牘書寫過程的側重點多在於文意中所表達的心境。書寫過程中的線條刻劃、結構安排則非尺牘之主要目的，筆法方面也無需雕琢修飾，字里行間的錯落與佈置也決非條幅書法那樣追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的藝術效果。正因爲如此，尺牘書法中最爲便捷、最爲簡單的書體形式，自然而然的成爲一般場合下人們常用的書體。這種自然規範下的尺牘體，免去了般條幅書法中的刻意追求之功；強烈表現的恰恰是自然的情趣和率意的境界。

然而，即使是最率意的尺牘書法，也同樣再現了傳統書法承上啓下的關係。那些自然率意的用筆和結構分佈，充分表現出作者的書法風格及其特征。從他們尺牘書法中既可看到作品本身及其作者對書法傳統的繼承，還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時期書法發展的脈絡。如元末明初書家張羽，他的書

法素有得「右軍曹娥碑」之稱，用筆方勁秀拔，本書所收《閒止帖》，除具有用筆方勁秀拔特點外，其行筆中的精妙筆鋒，以及纖婉之勢，皆顯現了元代末年特有的風格特征。那麼，明初諸多書法家，如三宋二沈，包括張羽在內的書法，都都表明了對傳統書法的繼承和發展。既便是小小的尺牘書法，其本身的書法風格，也不會是脫離社會而孤立存在的。因此《閒止帖》給予人們的不僅僅是書信的內容，書法表現的特征，同時還體現書法發展上承前啓後的關係，可以說這些尺牘所展示的每一幅作品都具有同樣的歷史、文學、藝術的綜合價值，是我們研究古代社會發展史的重要歷史資料。

三、尺牘的文學價值

尺牘（書信）是社會應用最為廣泛的信息傳遞手段，書信的內容和形式也是因人而異、緣事而發。

就其內容言，乃隨心所發。晉陸機《文賦》認為「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劉勰《文心雕龍·書記》認為「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并言「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于夬，貴在明決而已。」語言文辭有平淡直敘、言簡意賅、一句而告罄者；也有措辭煉句、設典集、千言而意不盡者。文辭內容有涉及詩歌辭賦相互贈答的，有以序跋文論相互說教的，有以箴銘頌贊相互告慰的，以及雜記、傳狀、應答諸多文學言談形式。可謂是人間天地，包羅萬象。

3、前介：書札中的開場白，有承前啓後的作用，用來追言往事，回憶前情。本文中「舊歲辱書拜領久矣。有失奉答知罪殊深……令愛貴恙宜寬懷，且吉人天相必無慮也。」

4、恭維：屬問詢對方或頌揚對方以示關心對方的生活情況。如「兼句別來起居平安為慰」。

5、本事：是書信的主要內容，是致書人所言及對方的主要目的。根據事情的多少可長可短。它包括交際類的期約、饋贈、請託、慶賀等。也有政事類的治理、知任、兵事、民生。再有學述類和親屬類，諸如家計、嫁娶、訓誡、喪葬，對詩文書畫的議論等等。本事是我們了解歷史，研究古人傳略的重要資料。由於古代尺牘距今年隔久遠，又不具備前後情節，加上語句中多用典故，讀懂尺牘、通曉其內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尺牘的本事乃為全文的關鍵。本文從「詢及家父旌异之事……草率奉復」皆為本事。

就其尺牘形式而言，它是文學中諸類文體形式之一。除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分析到文章中各種文體外，歷史上各個朝代都有對文章體式的分析。清代姚鼐《古代辭類纂》把文章分為十三種文體，尺牘歸入書說類文體之內。然而，各種文體都有一定的書寫格局，就象詩詞一樣既有一定平仄的韻律關係，又有一定的體裁要求。尺牘同樣如此，按人們所歸納的，尺牘可分為九段式，即稱謂、書題、前介、恭維、本事、

附述、結束、記時、署押。以《朱存理致半隱札》為例：

1、稱謂：明確受書人，確定致書人與受書人之間長幼尊卑的親疏關係。「半隱老伯先生」，半隱是受書人，古代往來書信一般都以字相稱呼，「老伯」是對父輩的敬稱，因此可以確定「半隱」是朱存理的長輩，以全篇尺牘來看，「半隱」字高出全篇文字一格，這是一種針對對方親疏尊卑關係的抬頭方式，一般尊於本人一輩者多用單抬，從這個意義上看，也可判斷出受書人長幼關係。

2、書題：以卑達尊，借辭令稱呼對方。這種題稱早在戰國時就已通行，如「足下」。後人上書父母稱「膝下」，對尊長稱「尊鑒」，對平輩稱「閣下」等等。《朱存理致半隱札》中的「座下」乃是對官長的敬辭。朱存理在尺牘中向半隱「詢及家父旌异之事」是因「半隱」在朝廷具有一定要職。

6、附述：作為遺漏的補充，寫在信箋後的餘紙上。如與本事無關的告誡、勸慰，或祝頌對方身體安康，或朋侶情狀、或饋贈物品等等如「茶

果六斤……」即是。

7、結束：用謙和之詞結束信之內容。如「草率奉復，惟尊恕萬一。」即請對方諒解自己的失誤和不恭敬。以此作為結束的禮節性的歉意。

8、計時：書信的日期，如尺牘中的「二月初七日」。通過本事和計時可以推斷出尺牘作品的書寫年代。

9、署押：既簽名蓋章，附之行禮。一般尺牘多署名，也有姓名皆署的。如此札「朱存理再拜」。假若信函前面已署姓名，那麼後面的署押可用「名正肅」、「名正真」等。

另外還有一點，既尺牘書寫完畢，尾部留有餘紙。用「左沖」「謹空」等告誠之語，請對方指教。

上述尺牘的體例，是尺牘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尺牘文體形式較為全面的作品。在衆多的尺牘中，有很多尺牘未必象此件那樣繁復，而是僅書本事，署押罷了。但是無論寫得多麼簡單，哪怕是一句話的書信，仍超脫不了這種文體形式中的內容。歷代學者對尺牘文體的研究，都說明這種文體的存在，并具有普遍的實用意義。

淺談尺牘與尺牘書法

劉 恒

尺牘一詞，現在一般用來泛指書信。在我國歷史上，紙張未被發明和廣泛應用以前，竹木簡牘曾作為主要的書寫材料被人們長期使用。牘，即是用來書寫文字的木片。故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牘，書版也。從片。」從現代考古發現來看，秦漢時期的簡牘，長度一般在二十三厘米左右，大致相當於當時的一尺。漢代又規定以長度為一尺一寸的簡牘書寫詔令，稱為「尺一牘」。《漢書·匈奴傳》云：「漢遺書單于，以尺一牘。」又《漢書·李雲傳》云：「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李賢注曰：「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這種一尺左右的簡牘，簡稱為尺牘，用以泛指各種文書。後逐漸被用作書信的通稱。如《史記·扁鵲倉公傳論》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即是指緹縈上書皇帝，請求為其父太倉公贖刑之事。可見「尺牘」一詞，在西漢時即已被使用了。

與尺牘相近而同被用作書信代稱的詞還有尺書（《漢書·韓信傳》：「奉咫尺之書，以使燕。」唐顏師古注：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耳。）、尺紙（《宋書·郭璞傳》：「聊因尺紙，使卿等具知厥心。」）、尺翰（《陳書·蔡景歷傳》：「尺翰馳而聊城下。」）、尺素（唐張九齡《當塗界寄裴宣州》詩：「委曲風波事，難為尺素傳。」）、尺鯉、尺鴻（因古代有借魚雁傳送書信的傳說）等，都與「尺」這個長度單位有關。

作為人們溝通思想感情和交換信息情況的媒介，尺牘本身是一種具有多種文化價值的混合體。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尺牘中的許多內容，往往

為後人研究前代歷史提供了真實可信的第一手資料；在古代文學史上，尺牘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體而占有一席之地；對語言學和民俗學的研究來說，尺牘中保留了大量各個歷史時期的口頭語言和生活習俗；在書法藝術領域內，尺牘更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品種。可以說，尺牘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一筆重要財富。其作用和價值，在很多情況下是其它文物資料所無法替代的。

在我國，人們使用書信形式進行交往的歷史已經有兩千五百多年以上。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獻中，就不止一次地記錄了書信往還的事情。如《左傳·昭公六年》有「叔向使貽子產書」的記載，《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又云：「右師不敢人，受牒而退。」牒，亦為書信的一種形式。今天能見到的古代書信原跡，最早者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江陵雲夢睡虎地四號秦墓中出土的兩封書信。字體為秦隸，用墨書寫在兩塊木牘上。信的內容提到了秦統一六國和公元前二二四年的滅楚戰爭，還記錄了秦國士卒的生活及自備衣服費用等情況，當是秦始皇時期秦國士兵的兩封家書。

先秦時期，由於交通阻隔，傳遞不便，加上書寫材料為竹木簡牘或絲

帛織物，生產、攜帶、書寫都很困難，所以有條件使用書信往來的人，多為諸侯貴族和高級官員。書信的內容也多為政治和軍事情況。物質條件的限制，決定了書信的使用範圍是非常有限的。這個時期文獻史料中有關書信應用的記載和實物資料也非常有限。

秦國統一天下以後推行的書同文、車同軌等措施，無疑為經濟、文化、交通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因而進入漢代以後，書信的使用也得到了初步的發展。

兩漢時期，以「尺牘」為各種書信通稱的做法已經十分普遍，《史記》、《漢書》等史書中均有出現。尺牘作為一種實用的文體，已受到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士大夫的普遍重視。《後漢書·蔡邕傳》云：「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則掌握尺牘技巧者，可與精通經學者同被皇帝選用。可見尺牘體裁在當時已廣泛應用並且頗受愛好。漢代留傳下來的著名文章中，就有多篇為書信。如司馬遷《報任安書》、楊惲《報孫會宗書》、馬援《誠兄子書》、李固《與黃瓊書》等，情意真切，氣勢充沛。文采優雅，議論精闢。都已成為文學史上的名作。

漢代尺牘在使用範圍和數量上，較之先秦都有了明顯的擴大。在使用範圍上，先秦時期由於條件限制，使用者多為諸侯貴族和高級官員，內容主要是軍國政事。到了漢代，中央集權下各種行政制度的完善，經濟生產的發展，從主觀需要到物質條件，都為尺牘的廣泛應用提供了基礎。兩漢時期，尺牘的使用者已普及和擴大到一般文人與下級官吏乃至士卒。尺牘內容則包括表奏、公文、私信、家書等，反映了社會生活中各個領域的情況，成為研究當時歷史的重要材料。進入本世紀後，我國西北地區陸續出土了大批漢代簡牘，其中有很大數量的尺牘，彌補了以前漢代墨跡的缺乏，使我們看到了出自兩千年前普通人的手的真跡，為研究漢代的書法藝術提供了新的可靠依據。

魏晉南北朝時期，尺牘在重視程度、使用範圍、文學成就、書法藝術

等各方面，都獲得了大規模的飛躍，並且進入成熟時期。

從東漢開始出現的世家大族，到魏晉南北朝達到興盛階段。士族集團依靠自己的地位和影響，掌握着國家政權。作為士族本身，不僅需要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來維持自身的存在，而且同時也需要倚仗一定的文化基礎來標榜自己的身價，以顯示對一般寒門士子及百姓的優越感。這種文化資本在士族的發展和維護門戶地位的競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實上，東漢以來的名門望族，在學術文化方面都各有自家的專長和特徵。而缺乏文化修養的豪强大戶，即使具有相當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也終難進入士流，其地位也難以長久維持。與此相適應的是，魏晉時期，士大夫崇尚玄學清談，講求舉止風度，並且互相品評標榜。在這種風氣籠罩之下，士族自然格外注意自己的文化修養，否則便會遭人輕視，難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像《顏氏家訓·勉學》中所譏諷的：「及有凶吉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座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由於給別人寫信既須符合禮儀規範，又要講究文辭雅致，再配上瀟灑的書法，最能體現一個人的綜合文化素質。所以尺牘作為人際交往的手段之一，在此時期又成為士族階層顯示自己的文化優勢的一種必備修養，並且已形成一套專門的知識和技巧。《宋書·朱齡石傳》云：「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家，兄弟并嫻尺牘。」《宋書·劉穆之傳》則記載：「穆之與朱齡石并便尺牘。嘗與武帝坐，與齡石并答書。自且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盡管漢代即已有因精於尺牘而被皇帝召用的先例，但在魏晉南朝時期，嫓於尺牘，更被視為士族文化修養的標志，並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效仿。如《晉書·齊王攸傳》言其「善尺牘，為世所楷。」《宋書·王弘傳》則記載，「（王弘）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仿之，謂為王太保家法。」更有甚者，在給人寫信時如果出現禮儀上的錯誤，將會影響到自己的功名前途。如梁庾元威在《論書》中云：「私吊答中，彼此言感思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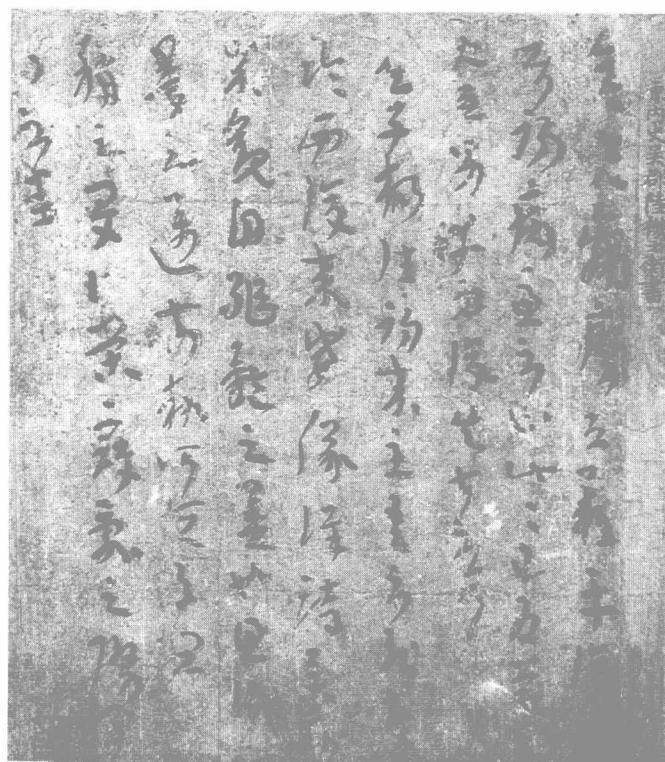
處人清議，終身不得仕。盛名年少，宜留意勉之。」

魏晉時期，紙張的普遍應用也為尺牘的普及創造了條件。利用紙張作為書寫材料，方便實用，較之簡牘絹帛，的確是一大進步，而士族階層注重禮法，慶吊往來頻繁，也使尺牘的使用範圍逐漸擴大。此外，當時出現了一大批作為尺牘範本的著作——書儀，其用途即是供人撰寫尺牘書信時參考套用。這更說明尺牘交往在當時已成為普遍現象。

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士大夫趣尚簡遠，品評議論，語言務求簡要。這種風氣在尺牘往還中也反映得十分明顯。其特點是篇幅短小精煉，語言簡潔含蓄，不管是含喧問候，還是論人議事，往往只用三言兩語，即可達到效果。讀來令人感到蘊藉雋永，回味無窮，表現了當時士大夫運用語言的能力。魏晉尺牘以其含蓄典雅，優美自然的特點，在文學史和書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對後世影響甚大。

從漢代開始，書法藝術進入自覺階段。趙壹的《非草書》描述了漢代人們對書法的喜愛與着迷情形。同時，收藏、欣賞書法作品的活動也已經出現。《漢書·游俠傳》記載：「（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到魏晉南朝，這種風氣更為普遍。由於受信人常常把來函作為書法作品收藏起來，因而寫信人在援筆臨紙之際，自然也力求把字寫得好一些，借此表現自己的書藝水平。梁虞翻《論書表》和唐張懷瓘《書斷》中都記述了王獻之給謝安寫信，自以為必被收藏。而謝安竟在其來信後面書寫回函然後送還，因而引起王獻之不滿的傳說。不管是否確有此事，但反映了當時的風氣大概是不會錯的。故北齊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雜藝》中告誡後輩說：「真草書跡，微需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之事，故無頓狼狽者。」

從漢代到魏晉南北朝，書法的藝術性還與實用目的緊緊結合在一起，嚴格意義上的創作作品極少。所以，應用廣泛的尺牘便成為人們欣賞和收藏的主要對象。流傳至今的魏晉墨跡，大多數也都是尺牘。可以說，這一時期的書法面貌及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尺牘形式反映出來的。



晉 陸 機 平復帖

到了隋唐，尺牘在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更為重要。這主要體現在大量書儀著作的產生，而且有些還帶有朝廷法令的色彩。對往來尺牘中禮儀、格式、稱謂、習語等形式要求更加嚴格。《唐六典》中對各種類型的公文尺牘從名稱用法到書寫格式也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在唐代，尺牘的種類和形式劃分為許多種，十分具體、細致。

同時，隨着尺牘的普及，其本身也逐漸顯露出世俗化和大眾化的端倪。尺牘本是人際交往的工具，「述往還之情，通溫涼之信」的實用價值才是其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尺牘能夠不斷發展和廣泛使用的根本原因。故敦煌文書中保存的唐黃門侍郎盧藏用撰《書儀·序》云：「古今書儀，皆有單復兩體。書疏之意，本為代詞，苟能宣心，不在單復。」到唐末五